

体认翻译学视域下《牡丹亭》中 “死亡”隐喻的英译研究

谢世坚 陈沙君

(广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体认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多重互动的体认活动。各译本间所呈现的体认差异,有效地揭示和验证了译者个人偏好、目标语言特性、翻译策略选用及其内在逻辑依据。中国古典戏剧《牡丹亭》中大量“死亡”隐喻反映了作者及其所处时代的体认机制,而其翻译则是译者基于原作内容与自身具身体验进行的体认识解。国外译者白之、国内译者张光前和黄必康的《牡丹亭》译本中“死亡”隐喻的翻译特征,展现了“死亡”隐喻的翻译策略及翻译效果。体认翻译学的理论框架适用于隐喻英译研究,并能阐释造成译本差异的主客观因素,为中国古典戏剧外译实践与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死亡”隐喻;《牡丹亭》;体认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6-0120-13

0 引言

当代文学大家巴金(1990:77)曾言:“像斯芬克司的谜那样,永远摆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字——死。”死亡是一个我们不得不猜的谜题。古今中外,人们对这一谜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而形成多种多样的死亡观。人类的死亡除了是生理和心理过程,同时也是社会过程,是文化现象,死亡意味着人的社会身份的解体。死亡是涉及人类生前、死亡过程和死后的认知图式、信念信仰和意义体系(雷爱民,2020:1)。法国思想家卢梭认为:“憎恶死亡是人的天性。”(段德智,2017:206)人们总是刻意回避死亡、制造死亡禁忌,营造一种没有死亡和看不见死亡的人生与社会,这一现象投射在语言符号系统中便产生了大量有关死亡的禁忌语和隐喻表达。

当代隐喻学认为,语言并非孤立于人类认知能力之外的形式体系,而是根植于人类认知活动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之中。隐喻是语言的人文特质,人类由于自身经历有限,认知能力又受到时间、空间及自身感官结构的掣肘,就必须依赖于隐喻机制,将已知的概念域映射

收稿日期:2025-05-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戏剧修辞比较研究”(19BYY098)、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隐喻认知视角下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戏剧死亡隐喻研究”(YCSW202418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谢世坚,男,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知语言学、戏剧语言与翻译研究。

陈沙君,女,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知语言学、戏剧语言与翻译研究。

引用格式:谢世坚,陈沙君.体认翻译学视域下《牡丹亭》中“死亡”隐喻的英译研究[J].外国语文,2025(6):120-132.

到未知概念域,通过特征转移来拓展体验与知识的边界。在表达生死、情感、时间等抽象概念时,隐喻更是不可或缺的、强有力的工具和武器。“死亡”具有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其语言符号主要表现为一种特殊的隐喻性语言,即死亡禁忌语。禁忌语往往侧重于凸显某些关键性特征,即将令人愉悦的部分映射至目标域,而隐藏始源域中的某些特征,即将那些引发不悦或尴尬情绪的元素隐藏起来(孙毅, 2021: 126)。本文所说的“死亡”隐喻指表达死亡意义的隐喻性语言,即将“死亡”概念投射至具体的体验性概念域的语言符号。

在文学翻译研究领域,围绕隐喻翻译的各个方面开展理论阐释,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胡壮麟(2019: 1-9)系统梳理了自20世纪60年代起学术界提出的隐喻翻译方法和理论导向。传统翻译研究过分聚焦于语言的“单向转换”,却忽视其深层次的认知和体验机制,限制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为了精准传达隐喻中蕴含的美学意蕴,不同译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这些选择植根于他们各自的“体认”机制之中。基于前人研究,本研究将运用体认翻译学(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的理论观点,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现实—认知—语言”三个要素出发对比分析《牡丹亭》三个各具特色的代表性英译本的隐喻翻译特征,探究“死亡”隐喻的翻译策略及其翻译效果,挖掘译本间差异的主客观成因,旨在为中国古典戏剧外译实践与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1 体认翻译学与隐喻翻译研究

翻译是科学和艺术的统一,是一项复杂、多维的人类认知活动。体认翻译学强调用“体”来实现意义上的相符,借助“认”来解释译文的多样性,主张翻译是译者借助多样化的体认手段,将原文所处现实与自身认知世界映射至译入语的过程(王寅, 2021: 47)。隐喻表达既涉及“体”,即与具体事物的互动体验,也包含“认”,因为事物间的同与异不由事物本身所决定,而是完全取决于人的主观见解。体认翻译学理论对隐喻翻译具有较强的阐释能力。

1.1 体认翻译学:译学研究新范式

巴斯奈特(Bassnett, 2012: 15-25)曾敏锐地指出,翻译研究正处于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由于难以突破传统观念的桎梏,面临被世界文学、后殖民主义和文化记忆研究等更具创新性的研究“超越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体认翻译学直面翻译研究的“困境”,构建了以库恩新范式为基础的学术共同体,彰显了一种全新的翻译研究视野(祝朝伟, 2023: 31)。体认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基于多重互动的体认活动,译者在透彻理解原文语篇所表达的有关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中各类意义的基础上,运用多种体认方式(如感觉知觉、意象图式、范畴化与概念化、认知模型、隐转喻、概念整合、识解、像似性等)将这些意义映射进译入语,基于创造性模仿机制将这些意义建构和转述出来(王寅, 2021: 46)。

体认翻译学正逐步崛起并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罗迪江等(2022: 113-121)认为,体认主义涉及翻译研究的“具身”“嵌入”“延展”与“生成”等多种体认机制,为翻译认知研究带来一种全新的范式。除对体认翻译学概念的构建与探讨外,部分学者亦从体认维度出发,针对各类翻译现象展开了详尽剖析。王寅(2019: 156-164)依据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选取《红楼梦》三个英译本内300条成语作为研究样本,对比分析了汉语成语英译的认知过程及其效果。孔令翠(2023: 18-27)运用体认翻译学的核心要素“体”与“认”探究了赛珍珠所译《水浒传》里酒文化元素的翻译策略。张可人(2023: 58-68)利用体认翻译学三要素框架对比《离骚》三译本在名物翻译上的处理特征,探讨了体认翻译学框架在诗歌研究中的适用性。可见,体认翻译学的触角已延伸到译本研究领域。遗憾的是,在体认框架下的隐喻翻译研究尚不多见,同时,现有研究也缺乏基于隐喻翻译实例对体认翻译学理论展开的深入阐释。

1.2 “认知”到“体认”:隐喻翻译新进展

认知隐喻学认为隐喻不仅是语言的表达手段,更是一种独具魅力、以一事物描写另一相关事物的思维方式。隐喻翻译研究也不再停留于修辞层面的语言符号转换,而应该深入人类认知的维度剖析隐喻映射的始源域和目标域以及二者能够构成映射的条件,挖掘原语篇章和译语篇章间对应的映射关系,或在缺乏直接对应映射的情况下提供合理的阐释与说明(刘冰泉等,2009: 72)。不少学者在概念隐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多种认知语言分析视角挖掘隐喻翻译活动背后的认知理据,凸显翻译实践的认知内核。陈家旭(2016: 22-27)从金融报道中隐喻的类型入手,依托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来探讨金融报道中隐喻的认知机制及其认知翻译策略。冯全功等(2017: 146-155)基于认知翻译假设对中国古典诗歌中星象隐喻依据映射条件予以分类,进而分析其翻译方法,却发现认知翻译假设由于难以察觉到隐喻在特定语篇中的差异化作用,无法全面阐释已有的星象隐喻英译现象。曹灵美等(2018: 94-99)基于象似性原则、概念隐喻理论和体验哲学的隐喻“三位一体”认知分析法,剖析《水浒传》四译本中“草”隐喻的象似性表征、跨域映射以及认知体验,进而提出了力求减少喻体损失的四类英译方法。肖开容等(2023: 154-162)以中国古诗的英译实践为例,对译者翻译过程中的概念重构和认知操作进行细致分析,揭示翻译转换背后复杂的认知机制。可见,学界基于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认知观开展的翻译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王寅(2023: 76)则创新性地提议以“体认”替换“认知”,以突破索绪尔与乔姆斯基基于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桎梏,以促成翻译研究从“认知”范式向“体认”范式的转换升级。

体认翻译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也逐步应用于隐喻及隐喻翻译研究。王静等(2024: 116-121)从认知主体性和始源域的客观多元性分析了宋词中“大雁”的不同隐喻映射所产生的不同目标域,阐明了动物隐喻的认知体验理据。孙毅(2023: 31-42)基于体认原则,归

纳总结了汉英血液隐喻的相同之处并结合文化脚本进行了精细的差异化分析,以此清晰阐释了该隐喻的生成机理。黄兴运等(2022: 89-97)以“愁”的概念隐喻为语料基础,在体认语言学观照下探究了隐喻映射“多源性”的发生理据。李瑛等(2022: 77-87)依据体认语言学的理论框架,探讨了唐诗隐喻英译的特征。隐喻英译是一个基于原文之本“体”的再“认”过程。不同译者对原文的识解与重构不仅体现了各自对原文这一客观文本体认过程的差异,而且还是译者风格、外界思潮以及翻译策略共同作用于译本的综合体现。因此,本研究在体认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下,着眼于《牡丹亭》三译本所呈现的差异,探讨各译者对原文“死亡”隐喻识解加工上的差异,以此厘清不同译者模式在隐喻翻译上呈现的显著特征及原因。

2 体认观下《牡丹亭》“死亡”隐喻英译对比

《牡丹亭》是中国古典戏剧文学中的不朽杰作,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都达到了中国古典戏剧的巅峰。全剧以 55 出的篇幅,演绎了生死梦幻的奇情异彩——“梦中情”“人鬼情”“人间情”。女主人公为情而死又因情复生,生生死死的奇幻情节对戏剧情节的发展和主题内涵的表达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戏剧中关于“死亡”隐喻的语言表达格外值得关注,如何跨越中英文化差异准确而精妙地传达出语言符号背后深厚的文化蕴涵是译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体认翻译学认为译者在阅读原文文本之后会透过字面意义和上下文获取与其相对应的认知意义(原型意义、内涵意义、概念意义),据此还可联想到其所描写的现实场境,这一过程便涉及“现实—认知—语言”三要素。译者在翻译时可选择三要素中任一(或二)要素作为翻译的主要依据,而且各要素之下还分有多种具体的处理方式(王寅, 2019: 157)。据此,本文主要探讨以下问题:(1)不同译者在选择“死亡”隐喻的翻译要素依据以及翻译处理方式时,是否存在独特的偏好或特征?(2)体认翻译学的三要素框架理论如何应用于隐喻翻译?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选取了《牡丹亭》的三个代表性译本作为考察对象,分别是国外汉学家白之(Cyril Birch)1980年的译本(以下简称白译)、我国古籍翻译家张光前教授2001年的译本(以下简称张译)和黄必康教授2021年的莎士比亚诗剧体全译本(以下简称黄译)。研究借助语料库分析工具 AntConc 4.2.4 对原文的“死”和“亡”两个关键参数进行检索,在此基础上,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人工检索和筛选语料库软件无法获得的隐喻表达,从中识别出“死亡”意义的非隐喻表达有 62 处,隐喻表达有 31 处。我们将从语言、认知、现实三个基本要素及其下属翻译手段出发,对比分析三部译本中“死亡”隐喻的翻译选择,描述翻译得失,并对“死亡”隐喻翻译呈现的特征进行阐释。

2.1 语言要素

在隐喻翻译的过程中,关注语言要素的译者希望能够在目的语中忠实呈现隐喻表达的原貌,让读者能联想隐喻深层含义的同时,还能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基于语言要素的翻译法体现的隐喻翻译认知机制为:(1)隐喻对等翻译。原语隐喻的始源域 A 通过语符转换在译入语系统中找到相同的始源域 A。(2)隐喻增减翻译。原语隐喻中始源域 A 隐藏的某个要素 a 通过语符转化在译入语中得以显现或因不切合译入语得以删减。(3)隐喻对等翻译+认知补偿。除了对等转换外,还利用译语中其他概念 b 进行补偿。具体如图 1 所示。本文根据上述三种翻译认知机制,结合隐喻翻译的实践特征,三种方法分别对应直译喻体、部分直译喻体以及直译喻体并辅以注释补充三种手段。依照划分,三种手段在各译本中的出现频次、频率见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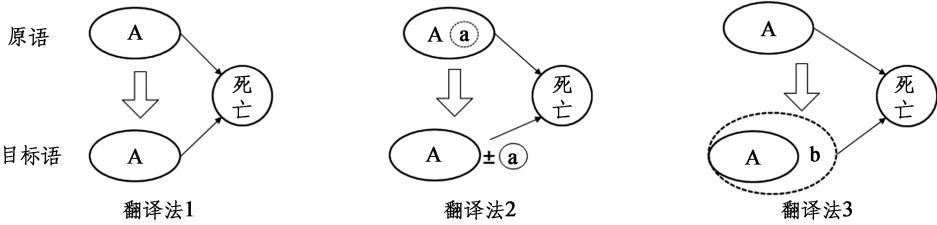


图 1 语言要素隐喻翻译的认知机制

表 1 语言要素翻译法频次频率

| | 白译 | 张译 | 黄译 |
|-------|----------|--------|----------|
| 翻译法 1 | 8(53.3%) | 4(40%) | 4(57.1%) |
| 翻译法 2 | 1(6.7%) | 6(60%) | 3(42.9%) |
| 翻译法 3 | 6(40%) | 0(0) | 0(0) |
| 合计 | 15 | 10 | 7 |

在整体上,在翻译“死亡”隐喻时,白译更加注重语言层次,出现频次最高,其次是张译,黄译相较而言不善采用语言转换,频次最少。从三种翻译方法的分布来看,张译和黄译偏好直译,鲜有认知加工,白译则更善于使用原语的映射方式辅以补充释义的手段展现“死亡”隐喻特征。以下摘选一段具有典故内涵的“死亡”隐喻语言表达及其翻译为例。

例 1 做行云先渴倒在巫阳会。^①(《牡丹亭·诊祟》)

白译: Thirst struck this sailing cloud at Witch's Mount. (According to the *Gaotang fu* by the pre-Han poet Song Yu, Witch's Mount [Wushan] at Gaotang was where Prince Hui of Chu made love in a dream to a beautiful woman who told him, “At dawn I am the morning clouds, at dusk the driving rain.”) (Birch, 1980: 89)

① 本文例句所引用原文均出自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 年出版的《汤显祖戏曲全集·牡丹亭》。各例中“死亡”隐喻的语言表达均用下划线标明。

张译: Why be a cloud but at your own thirst die? (Zhang, 2001: 131)

黄译: You wanted to be free, like clouds in the air,

Flying aloft, yet you fell to the ground,

Thirsty for a magic drink of unseeing love,

And dying for a spectre in an erotic dream! (Huang, 2021: 175)

例1 引用了战国时期楚宋玉《高唐赋》中楚襄王和巫山神女梦中欢会的故事,“行云”代指巫山神女,“巫阳”即巫山之阳(南),代指欢会之所。原文用“行云”比喻女主人公杜丽娘,用“渴倒”隐喻杜丽娘之死。白译和张译都采用了语言层面的直译,但白译对“行云”“巫山”均进行了注解,以帮助读者理解并感受中国文化底蕴。张译则略显生硬,难以传达语言背后的文化色彩。

此外,三位译者在三处隐喻性语言的翻译过程中都选用了语言层面的翻译手段,其中涉及两个重要的概念隐喻,即“死亡是植物的枯萎”(例2)和“死亡是财物的损失”(例3)。在“生命是珍贵物品”隐喻的基础上,财物的损失可用来隐喻“死亡”;在“人是植物”这一隐喻的基础上,生命早期是嫩芽,成熟是盛开,死亡是枯萎(谢世坚等, 2024: 62-63)。这从根源上由英汉文化中相似的认知体验所决定。人类面临的客观世界是基本相同的,人类感知客观世界的身体器官是相同的,所以人类的认知心理过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认知模式也是相差无几的。

例2 当今生花开一红,愿来生把璇椿再奉。(《牡丹亭·闹殇》)

白译: In this life

A flower no sooner red ...

Ah, let me only serve anew

These parents, lily and cedar, in the lifetime to come. (Birch, 1980: 101)

张译: In this life, I bloomed and faded all too soon,

Yet, I hope I can serve you in the next. (Zhang, 2001: 146)

黄译: I, like a flower, bloomed once for your pleasure,

And I wish I shall wait upon you and father

If ever I will come back for another life. (Huang, 2021: 198)

在例2中,杜丽娘哭诉自己的生命像鲜花一般,经历最鲜红绚烂的瞬间便走向枯萎,将生命投射至植物,用“植物的枯萎”隐喻“死亡”。英汉文化中均有以植物的生命隐喻人的生命的认知基础,将植物生长的阶段对应于人类生长和发育的阶段,因而在语言层面直译喻体能够传达其中完整的内涵意义。

例3 肠断三年,怎坠海明珠去复旋?(《牡丹亭·遇母》)

白译:Three years of heartbreak;
What brings the cruel sea
To give back now its shining pearl? (Birch, 1980: 278)
张译:My heart has been three years dead.
How did my lost pearl manage to reemerge? (Zhang, 2001: 388)
黄译:Three years of my grief and sighs have past
During which time my salt tears fell for you,
And my heart bled for your untimely death.
O, now, my soul's delight! Could it be true
That my lost pearl has thus been retrieved
From the depth of the very fathomless sea! (Huang, 2021: 563)

在例 3 中,杜母将去世的杜丽娘形容为“坠海明珠”,以“明珠”这一珍贵事物的遗失隐喻“死亡”,而闪亮的珠宝在中外文化中都是弥足珍贵的宝物,同样基于人类共通的认知体验,“死亡是财物的损失”这一概念隐喻能够跨越文化差异达成认知共识。

2.2 认知要素

体认翻译学认为,认知连接现实与语言,是对现实的反映,也是语言的源泉。在翻译活动中,认知是意译的源头,主张意译的译者追求文本在认知维度上达成对等,适度摒弃语言层面的刻板对应。隐喻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行为。异彩纷呈的文化导致了隐喻投射上的差异性,语言要素的直接转化多会导致疑惑和误解,因而大多译者会不同程度地关照译语读者的认知能力与审美习惯,藉由体认的认知要素展现原文隐喻的深意。基于认知层面的隐喻翻译认知机制为:(1) 隐喻原型翻译。原语隐喻始源域 A 在译入语系统中无对应概念或不能触发某种联想,因此挖掘原语隐喻的原型认知意义并常在译语中表现为直接使用目标域。(2) 隐喻替换翻译。原语隐喻始源域 A 在译语中变为同一认知域中相邻或等效始源域 B。详见图 2。鉴于此,基于认知要素的“死亡”隐喻翻译主要有两种方法:(1) 译出死亡本体含义;(2) 以译语中的其他始源域替换原文的始源域。根据这一划分对三译本中“死亡”隐喻的翻译标注后所得数据见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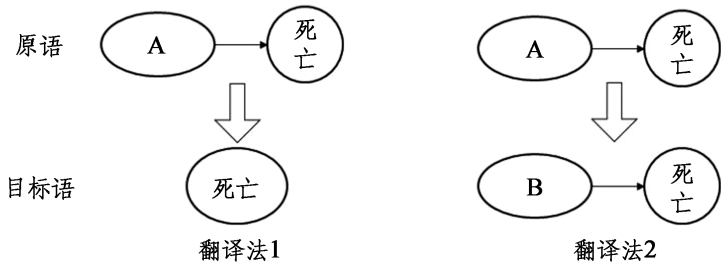


图 2 认知要素隐喻翻译的认知机制

表2 认知要素翻译法频次频率

| | 白之译本 | 张光前译本 | 黄必康译本 |
|-------|-----------|------------|------------|
| 翻译法 1 | 5 (45.5%) | 5 (27.8%) | 6 (37.5%) |
| 翻译法 2 | 6 (54.5%) | 13 (72.2%) | 10 (62.5%) |
| 合计 | 11 | 18 | 16 |

从表中可以得知,三译本对隐喻认知要素的解读都相当重视。从具体译法来看,三位译者都少有直接译出死亡隐喻的原型认知范畴,英汉文化都存在死亡禁忌,力避使用“死亡”本体。对比发现,张光前更擅长在认知域中的不同范畴进行转化翻译以切合译语文化。针对“不幸”这一隐喻表达的翻译凸显了三位译者各自的翻译倾向。

例4 你女儿不幸,作何处置? (《牡丹亭·闹殇》)

白译: Mother, if the worst befall, what will become of my body? (Birch, 1980: 101)

张译: If your daughter passed away, what would you do with her remains? (Zhang, 2001: 146)

黄译: Mother, I'm dying beyond any remedy. Let me know where shall my body go? (Huang, 2021: 199)

例5 你如今不幸,坟孤独影。(《牡丹亭·闹殇》)

白译: If the worst should befall now, then the lone grave mound will cast a single shadow. (Birch, 1980: 102-103)

张译: But if you should pass away now, you would be all alone in your grave. (Zhang, 2001: 148)

黄译: What a misfortune befalls

On you now. If the worst is to come and comes, you will

Have but a lonely grave accompanied by a lonely shadow. (Huang, 2021: 201)

原文巧妙地以“不幸的事情”隐喻“死亡”,白译和张译在这两处不谋而合,均采用了相似的转换策略,将原文中的始源域置换为译入语文化中相邻且易于理解的始源域——“糟糕的事情”与“离去”。这样的翻译处理不仅巧妙地保留了原文的语言韵味与深层含义,还确保了译文的自然流畅与地道表达。黄译的翻译方法却有较大的差异,其两处译文的语言表达也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本人的翻译理念所影响。黄必康主张在翻译《牡丹亭》时,采用英语读者所熟悉的莎士比亚诗剧体语言,巧妙融合莎士比亚诗剧体与散文语言,以实现原作艺术再创造。在此理论指导下,译者出于对诗歌音韵节奏的高度关注,在第一处译出“死亡”的原型意义,选用“dying”一词以满足莎士比亚素体诗五步抑扬格的韵律结构,增强了语言的音乐性;而在第二处则直译隐喻,运用“befall”一词与后文“will”共同建

构了一种音韵和谐的美感。

2.3 现实要素

体认翻译学认为,现实要素导向下的翻译要求译者充分理解原文字面义和背后原型义,并将其与上下文语境相结合而生成译文。隐喻的跨语言理解以体验哲学和文化意蕴双象限为支柱,在共通的具身体验基础上,纷繁复杂而又独具特色的文化背景会导致部分隐喻表达形式和意义具有不可译的特征。汉英两个民族在地理疆域、历史沿革、宗教信仰、生活习惯、民俗心理和审美情趣等方面均相去甚远,因此双方对同一语言形式的理解会产生差异,同一隐喻表达所激活的认知域也不尽相同。跨语言的隐喻翻译往往导致误解或难以理解,原文意义传达容易受阻,译本的功能也会相应地削弱。在此情况下,引入现实要素可以对不可译的成分进行调和,凸显原语隐喻的语用意图和美学特质。如图 3 所示,基于现实要素的隐喻翻译认知机制为译者在文外或文内语境 c 下将原语隐喻的始源域 A 转换为译语概念 B,进而实现等效传达或提升可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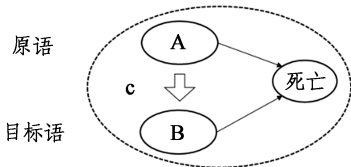


图 3 现实要素隐喻翻译的认知机制

基于上述界定,本研究统计了三译本在现实层面所采取的翻译法,详见表 3。

表 3 现实要素翻译法频次

| | 白之译本 | 张光前译本 | 黄必康译本 |
|-----|------|-------|-------|
| 翻译法 | 5 | 2 | 7 |

观察发现,张译不善构建现实语境辅助读者理解原文深意;黄译则相反,常依托上下文或自我建构语境对原文意象进行重构,让西方读者更易接受,并在语言形式上契合莎士比亚诗剧体。白译处于两者之间。例 5 中杜母哀叹自己早年丧女,本期待丽娘长大成人送走双亲长辈,此处用“把俺高堂送”隐喻表达“杜父杜母的死亡”。“高堂”原指中国古代父母居住的地方,后逐渐引申为对父母的尊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称谓。译者难以在英语体系找到与之形成理想对应的概念,故三位译者均选取了认知要素或认知要素与现实要素相结合的翻译方法。张译在认知层面将“送父母走”这一始源域转化为“将父母送进坟墓”,而白译和黄译均选择在现实层面进行了语境补充,黄译在上下语境的影响下,将原文译为“照顾年老的父母”,却抛弃了“死亡”的隐含意义。白译不仅译出“为父母送终”之意,而且添补了“照顾父母,为其养老”之意,加强了译文的前后连贯性,也有助于英语文化背景的读者理解。

例 5 但成人索把俺高堂送。恨天涯老运孤穷。(《牡丹亭·闹殇》)

白译: Grown now to womanhood, she was to care for us, her revered elders, at our end but now, alas, childless and lost shall we remain at rim of sky. (Birch, 1980: 101)

张译: We had hoped she would see us to our grave, but why are we forsaken at old age! (Zhang, 2001: 146)

黄译: Growing up you'd take care for our old age.

But fortune favours not our elderly hope-

We would be left childless and alone,

Passing through nature to eternity! (Huang, 2021: 198)

3 结论与阐释

本文基于体认翻译学“现实—认知—语言”的核心原则对《牡丹亭》“死亡”隐喻的英译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三个译本的隐喻英译表达在三个要素上的分布不尽相同,白之、张光前与黄必康三位译者在翻译处理上呈现明显差异,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各要素翻译法频次频率表

| | 白之译本 | 张光前译本 | 黄必康译本 |
|------|-----------|-----------|-----------|
| 语言要素 | 15(48.4%) | 10(33.3%) | 7(23.3%) |
| 认知要素 | 11(35.5%) | 18(60.0%) | 16(53.4%) |
| 现实要素 | 5(16.1%) | 2(6.67%) | 7(23.3%) |
| 合计 | 31 | 30 | 30 |

张译和黄译展现了对认知要素的格外关注,其比例均超过一半,张译相较忽视现实要素,而黄译在三位译者中最注重现实要素。在白译中,语言要素最为重要,认知要素次之,现实要素再次之。三译本体现的对翻译三要素的重视程度分别为:

白译:语言要素>认知要素>现实要素

张译:认知要素>语言要素>现实要素

黄译:认知要素>语言要素=现实要素

可见,三个译文基于现实要素的译法占比都最小,较少译出隐喻在当下语篇的外延意义,因为增添内容难免带有较浓厚的个人情感,且所增添内容在字面上与原文显然存在差异。如在例1中,黄译的填补与创造固然使情节画面和音韵节奏更具美感,迎合英语读者的审美需求,但却失去了中国典故的深厚历史感和中国文化的传统意蕴。三位译者隐喻翻译过程的关注差异进一步说明了外国汉学家译者、国内古籍翻译者和莎士比亚学者在翻译处理上存在差别。译本内部对比可知,国外汉学家更偏重语言要素,中国译者更重视认知要素。此外,作为莎士比亚学者,黄必康的译本强调诗剧韵味,从现实要素出发在译本中注

重移植莎剧的语言风格,致力于戏剧语言艺术的拼贴、融合。

具体来说,汉学家译者白之自幼浸润于英语母语环境之中,深受英语文化的熏陶与影响,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更倾向于从译文读者的视角有效且恰当地传递原作的深层含义。白之译本以其流畅、地道的英语著称,多选取意译的翻译手法,在认知层面力求真实再现原作的文化内容。除译者身份外,特定的翻译目的以及预设的意向读者群体同样会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策略与方法产生影响。白之译本最初旨在服务于美国汉学研究和汉语语言文学教育体系,因而极其重视原作的语言魅力与文化底蕴的展现。在处理隐喻翻译时,白之多运用语言要素的直接转换策略,并辅以认知补偿,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与流畅性。在处理独具中国特色的语言表达时,白之更是不遗余力地采用西方读者易于接受的方式传递文本信息和文化内涵,在译本中加入了300多个脚注,详尽解释了中国文化的相关背景与内涵。综合来看,国外汉学家白之处理隐喻翻译的理念和策略与以往学者对其翻译规范的考量与探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统一的(赵征军,2018:62-66)。

中国翻译家在译介中国戏剧时,多侧重于传递中国戏剧的独特之美。译者具备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和专业素养,更易把握原文精髓。然而,在面向对中国文化认知有限的西方读者时,中国翻译家的译介工作可能存在包容性不足的问题。张光前教授身为中国古籍翻译专家,古文功底十分扎实,在原文的理解和表达方面更为准确,因而也更善于从认知层面进行范畴转换,力求避免英语读者的迷惑和误解。此外,中国译者秉持着文化自信的理念,对原文的文化内涵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尊重,在唱词和诗句的翻译上,张光前多使用素体诗的格式,以抑扬格为基本节奏(汪榕培,2000:35),并试图保留原文的节奏、韵律甚至是原文的分行方式。因此,在隐喻翻译上,中国翻译家倾向于照顾译本节奏韵律,兼顾语言形式和意义,力求以英诗译汉诗,在“传情达意”的基础上顾全译文语言的结构布局,而在现实层面的勾勒补充显得不足,整体上重视意境,语言表达呈现简化特征。

黄必康虽然是中国翻译家,但作为一名莎学专家,他多年潜心于莎士比亚和中国古典戏剧的对比研究,对莎士比亚诗剧体语言有独特而深刻的见解。黄译巧妙化用莎士比亚诗剧体和散文语言,在翻译过程中寻觅汤莎戏剧话语和文化契合,尽可能忠实地再现了原作的语言细节、独特的审美意象、至情的诗意情感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黄必康,2022:197)。黄必康认为,西方读者难以读懂汤显祖以典雅繁复的古典汉语及历史文化典故编织的戏剧诗文与曲辞,也不易从意境中捕捉其中暗含的人物塑造和心理描写。因此,黄译在隐喻翻译上较少采用语言要素之间的转换。译者主张“以经典对话经典”的翻译理念,力求从认知和现实层面引起跨语言跨文化的共鸣,借用英语文化中的对应范畴与原作语言实现语义对应,充分顾及译入语阅读者的文学鉴赏力和审美偏好。

4 结语

本文借助体认翻译学的“现实—认知—语言”框架,对比考察了《牡丹亭》分别代表中国古典戏剧译介三类模式的英译本在31处“死亡”隐喻的处理情况,结果发现,三部译作各有倾向,其译本的传达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且译者的母语文化烙印、个人身份背景以及所持翻译理念共同影响译语的呈现特点。研究表明,三位译者在隐喻翻译过程中都兼顾了体认翻译的三个层面,但国外汉学家译者注重译语读者,强调语言要素以达成汉语文化研究的目的并辅以认知要素以确保原文文化得以理解;国内译者注重译作本身,兼顾认知和语言要素以展现中华文化之美;具有莎学背景的译者主张借莎士比亚讲好中国经典故事,故而特别关注现实要素以实现汤、莎戏剧话语和文化的契合。本研究论证了体认翻译学“现实—认知—语言”三要素在隐喻翻译中的适用性,试图为隐喻翻译研究构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希望能够为富含大量独特隐喻性语言的古典戏剧外译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参考文献:

- Bassnett, S. 2012. Translation Studies at a Cross-roads [J]. *Target* (1): 15-25.
- Birch, C. 1980. *The Peony Pavilion (Mudan Ting)*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B. 2021. *The Peony Pavilion (Translated in Reference to Shakespeare's Poetic Style)* [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Zhuang, G. 2001. *The Peony Pavil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巴金. 1990. 巴金全集(第13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曹灵美,柳超健. 2018. “草”隐喻的英译认知研究——以《水浒传》四个译本为例[J]. 中国翻译(6): 94-99.
- 陈家旭. 2016. 金融报道中的隐喻认知及其翻译研究[J]. 上海翻译(6): 22-27.
- 段德智. 2017. 死亡哲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冯全功,刘春燕. 2017. 中国古典诗词中星象隐喻英译研究——基于认知翻译假设的分析[J]. 中国文化研究(1): 146-155.
- 胡壮麟. 2019. 隐喻翻译的方法与理论[J]. 当代修辞学(4): 1-9.
- 黄必康. 2022. 译者札记:莎士比亚诗剧体《牡丹亭》全译本[J].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1): 196-208.
- 黄兴运,谢世坚. 2022. 体认语言学观照下隐喻映射的“多源性”研究——基于“愁”的概念隐喻分析[J]. 外国语文(3): 89-97.
- 孔令翠. 2023. 实践论和认识论视域下的赛珍珠《水浒传》中酒文化翻译之“体”“认”分析[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 18-27+110-111.
- 雷爱民. 2020. 死亡是什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瑛,杨运杰. 2022. 体认语言学视域下的唐诗隐喻英译特征研究——以《许渊冲经典英译古代诗歌1000首:唐诗》为例[J]. 语言教育(2): 77-87.
- 刘冰泉,张磊. 2009. 英汉互译中的认知隐喻翻译[J]. 中国翻译(4): 71-75+95-96.

- 罗迪江,唐雪. 2022. 翻译研究与认知范式交叉融合的途径[J]. 外国语文(6): 113-121.
- 孙毅. 2021. 汉英认知辞格当代隐喻学一体化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孙毅. 2023. 汉英“血(blood)”隐喻词簇异同及其体认语言学——文化脚本理据阐发[J]. 外国语文(1): 31-42.
- 汪榕培译. 2000. 牡丹亭[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 王静,李亚茹. 2024. 体认语言学视角下宋词中“大雁”的隐喻研究[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 116-121.
- 王寅. 2019. 体认语言学视野下的汉语成语英译——基于《红楼梦》三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J]. 中国翻译(4): 156-164+190.
- 王寅. 2021. 体认翻译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J]. 中国翻译(3): 43-49+191.
- 王寅. 2023. 从翻译的认知观、认知翻译学到体认翻译学[J]. 语言教育(4): 72-80.
- 肖开容,文旭. 2023. 翻译中的再概念化认知操作:以中国古诗英译为例[J]. 中国翻译(1): 154-162+190.
- 谢世坚,陈沙君. 2024. 认知隐喻学视域下《哈姆雷特》中的“死亡”隐喻分析[J]. 贵州师范学院学报(9):60-67.
- 张可人. 2023. 体认翻译观下《离骚》三译本名物意象对比研究[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 58-68.
- 赵征军. 2018. 汉学家白之英译《牡丹亭》戏剧翻译规范探究[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62-66+74.
- 祝朝伟. 2023. 体认翻译学:一种新范式的兴起[J]. 中国翻译(4): 29-38+192.

A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onceptual Metaphor of “Death” in *The Peony Pavilion* from Embodied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Perspective

XIE Shijian CHEN Shajun

Abstract: According to Embodied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translating is a special, multi-interactive cognitive activity. The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 between different translations reveal and verify the translator's personal inclin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selection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he internal logic basis. The “death” metaphors in *The Peony Pavilion*, one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dramas, show the embodied cognitive mechanism of the author in hi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ir translation is the translator's embodied cognitive construal based on the original text and the translator's embodied experience. This study uses the three-element framework of ECT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lation of “death” metaphors in three English versions by the foreign translator Cyril Birch (1980), domestic translators Zhang Guangqian (2001) and Huang Bikang (2021). Consequently, the study generalizes thei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the “death” metaphors and translation effects in *the Peony Pavilion*, verifie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framework of ECT in the study of “death” metaphors, and delineates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that cause the differences in translation, thu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drama.

Key words: conceptual metaphor of “death”; *The Peony Pavilion*; Embodied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责任编辑:陈宁